

康有为致大隈重信书翰释证

李成晴

内容提要: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大隈文书”中,存有康有为致大隈重信书札四通,未被《康有为全集》及《康有为往来书信集》收录。四札作于1918年至1921年之间,其中第二通与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稿本为同一信函,“大隈文书”藏手迹为定本,台藏手迹为草稿。四札所涉及的人事及思想,可与其他刊布资料互证者颇多,是研究康有为生平交游及民国史事的新材料。

关键词:康有为 大隈重信 “大隈文书” 信札

大隈重信是日本明治时期的重要改革家,曾历任外务大臣、内阁总理大臣等职位,并创办著名学府早稻田大学。他与近代中国多位政要皆有往来,相关资料完好地保存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专门设立的“大隈文书”之中。康有为与大隈重信之交游,学界研究已有所涉及^①。康氏避难日本时,大隈重信曾殷勤护持^②,至二人晚年,没有再度相见,唯翰札往来,未曾中断。

康有为与大隈重信的往还书札,存世者很少。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及张荣华编《康有为往来书信集》,只收录康有为《与大隈伯书》、《覆大隈侯爵书》、《与大隈重信书》三札,分别据《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不忍》杂志第九、十册合刊以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手稿采录^③。前两函属于康有为生前公开发表之作,从辞气及行文看,显然是在发表时多有增益润色,故文长千言,语似政论,未必是真实的函札原貌。较为接近私人信札本色的,只有台藏手稿一通,然此函实际只是一份未定之草,下文将详细论及。

①详参茅海建:《“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20-142页;茅海建:《康有为与他的〈我史〉》,《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第94-109页。

②康有为《大隈侯大德颂》中说“有为蒙授餐适馆之雅,荷饮食教诲之恩”(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第十一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2页),便是追忆二人之交游。

③《康有为全集》第五、十、十一册,第164、421、153页。张荣华编:《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9页。

笔者在查阅域外汉籍资料的过程中,注意到“大隈文书”中有卷轴装裱函札一轴,共收书信六通,其中有四通系康有为致大隈重信之函。康函第一通与第二通之间イ14 B0269 0002号“贼名既出贼口,罪目至重”云云,无抬头落款,著录作《中华某书翰》;康函第二通与第三通之间イ14 B0269 0004号即是孙中山著名的《致大隈重信函(1914年5月11日)》。今据著录信息,将此卷轴信函列表如下:

著录号	函札题名	页数
イ14 B0269 0001	康有为书翰:大隈重信宛(一)	1
イ14 B0269 0002	中华某书翰	1
イ14 B0269 0003	康有为书翰:大隈重信宛(二)	3
イ14 B0269 0004	孙文书翰:大隈重信宛	8
イ14 B0269 0005	康有为书翰:大隈重信宛(三)	1
イ14 B0269 0006	康有为书翰:大隈重信宛(四)	1

表1

孙中山《致大隈重信函》见于《孙中山全集》第三卷^①,编者标注出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照片”^②,推测应是据此卷轴拍照而得。而《中华某书翰》因作者无考,其价值尚难推定。其馀康有为函札手迹四通,未被《康有为全集》、《康有为往来书信集》收录,迄今为止研究康有为的专著、论文也皆未提及,日本史籍协会编《大隈重信关系文书》^③全六册截至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也未加以著录。由此可见,康有为致大隈重信佚札四通作为研究康有为生平交游的第一手资料,有待整理考释以公诸学界。兹据康有为手迹释文考证如下,并附佚札照片于文末。

第一通(著录号:イ14 B0269 0001)

大隈侯爵执事:

入春,伏惟颐养万福。有万绳栻君,志大而思远,前为张大帅勋参谋长,虽失败而坚毅不改。顷东游,而最慕明公,幸赐住接而进教之,至感!敬问兴居。

康有为拜启,四月七日。

按,第一通系推荐万绳栻拜访大隈重信的介绍函。万绳栻(1879-1933),字公雨,晚号溪园,江西南昌人。参与张勋复辟时,与胡嗣瑗同授内阁阁丞。失败后,于清室办事处任职。后又参与伪满洲国之建立,任执政府秘书处秘书,有集

①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2011年,第84页。

②《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87页。

③日本史籍协会编:《大隈重信关系文书》,侯爵大隈家藏版(非卖品),1932年。

李商隐诗一卷，名《抒澹集》^①。生平事迹略见于温肃《万果敏公墓志铭》^②。

康有为四通佚札中唯第二通落款标出作年“庚申七月十三日”，即阳历1920年8月26日。由此上推康札第一通四月七日当在1920年当年或之前^③。又札中有万绳栻“前为张大帅勋参谋长，虽失败而坚毅不改”的评语，知万绳栻东游日本在张勋“丁巳复辟”失败（1917年6月）之后。温肃《万果敏公墓志铭》称：“（‘丁巳复辟’）事败后，世人责公轻举，公绝口不置辩。敌人缉公甚严，公未尝以敌曾列名盟书之隐私作抵制之计也。公既脱险，即东游日本，交其贤豪。”^④所谓“公既脱险，即东游日本”，恰可与康有为此札印证。盖万绳栻于“丁巳复辟”事败后为躲避通缉赴日本。“交其贤豪”，当即指大隈重信，而介绍函即康有为此札也。又“丁巳复辟”在6月，而康有为佚札落款作“四月七日”，最有可能是第二年之四月初七。综上可推万绳栻往谒大隈重信时间当在1918年，而此札系年当即1918年四月初七日。

《康有为往来书信集》中收录康、万往来书札两通。从第一通万绳栻复康有为函（1916年11月22日）中“月前文旌莅临，适在病中，竟不得一睹颜色，缘悭自憾，如何可言……日者晋谒门墙，亲承轨范”数语^⑤，可以看出万绳栻结识康有为即在1916年。在张勋拟议入京时，康有为又致电万绳栻等，称“望贵府主亦只可作壁上观。报中有言入北者，想误。暂时切勿登场为要”云云^⑥，亲自与谋其事。当张勋准备复辟时，“（张勋）带兵进京，本有复辟之意，以各方面多不赞成，未敢猝发。入京以后，仍力谋进行。日前由张之参谋万绳栻等密电康有为等来京。康既入京，即寓张宅，其谋遂决”^⑦。可见康有为与万绳栻之往复，多围绕“丁巳复辟”而发生，诸条资料正可释证康有为佚札第一通“前为张大帅勋参谋长，虽失败而坚毅不改”之语，则万绳栻避难日本由康有为作札向大隈重信介绍，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通（著录号：I 14 B0269 0003）

违离大教久矣，东望沧波，劳思不可任。小女同复^⑧偕婿潘其璇^⑨晋谒，获闻明公矍铄如昔，康强逢吉，不胜喜忭。又承厚赐小女多珍，不胜至感。

①万绳栻：《抒澹集》，《丛书集成续编》影印民国武进陶氏涉园刊《喜咏轩丛书》甲编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599页。

②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十二，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519—520页。

③以册页或卷轴的形制装裱往来信札，是民国及前代士人的传统。其同一人不同日期信札，皆据书信时间先后为次第，盖文物、史料保存之中兼寓系年之意。

④《辛亥人物碑传集》卷十二，第519—520页。

⑤万绳栻：《复康有为》，《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4页。

⑥康有为：《致万绳栻等》，《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5页。

⑦许指严：《民国十周纪事本末》下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412页。

⑧即康有为第六女康同复，嫁与康氏弟子潘其璇。

⑨潘其璇（1898—？）字叔矶，号澹如，广东南海人。曾留学日本，后师事康有为，书法亦效康体。

辰山溽暑，伏维绿野优游，尊候万福。顷小门人曾广伦（曾官海军）东游，令其晋问起居。前年明公八十高寿，未致称祝，今补寄薄物，敬祝期颐。敬问大隈侯爵大安。

康有为拜启，庚申七月十三日。

福甕无量寿佛一尊，汉玉双寿星，龙印（乾隆内府），刻画屏，凡四事，伏希哂存。有为。小女同复附请大安。

按：第二通系对大隈重信赠康同复夫妇礼品致谢并命曾广伦致贺礼之函。本札作年（庚申，1920）明确，各种辅助信息保存得也最完整，甚至信封亦装裱于函札之后，上题“曾广伦面呈，外物四事/大隈侯爵钧启/上海新闸路辛园十六号缄”。其中“上海新闸路辛园十六号”为康有为在上海的寓所。

康有为札中谓曾广伦“曾官海军”，今考《海军各学校及教育机构历届毕业生学员名册》，著录曾广伦是清廷海军留日学生第二届驾驶班中的一员，毕业于1912年^①。而《辛亥·海军：辛亥革命时期海军史料简编》则著录为第三期航海科学员，1910年2月1日入学，1911年2月5日毕业，学界研究亦多以曾广伦为第三期留日学生^②。又大隈重信生于1838年，此函谓“前年明公八十高寿”，与落款“庚申”正相合。

《康有为全集》以及《康有为往来书信集》所收《康有为致大隈重信》，系据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藏康有为手稿逐录，全文曰：

久违大海，常切身思。春间小女偕婿东游，获谒耆英，过承优待，既赐明训，又并锡多珍，感激不任。天下滔滔，夫何可言？惟幸君侯绿野优游，天锡难老，康强逢吉。（注：手稿，藏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③

通过台藏此函与“大隈文书”佚札第二通相比勘，可推断台湾“中研院”所藏手稿当系佚札第二通之草稿。首先，“久违大海，常切身思”与“远离大教久矣，东望沧波，身思不可任”表述近似，“春间小女偕婿东游，获谒耆英”与“小女同复偕婿潘其璇晋谒”表述近似，“又并锡多珍，感激不任”与“又承厚赐小女多珍，不胜至感”以及“惟幸君侯绿野优游”与“伏维绿野优游”在关键词上更是惊人地一致。若谓两函系先后所寄，就很难解释内容上的雷同。且台湾“中研院”所藏至“康强逢吉”戛然而止，缺失了结语及祝祷、落款部分，显系未定之草。

《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编者于台藏手稿系年为“1921年夏”，题下注曰：“1922年《祭大隈文》有‘去春吾女同复问安于江户’语，则此书应作于前一年。”^④按此处

①杨志本：《中华民国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7年，第500页。

②中国航海博物馆：《辛亥·海军：辛亥革命时期海军史料简编》，山东画报出版社，2011年，第54页。包遵彭、罗尔纲引证文献皆同此说（包遵彭：《中国海军史》第十五章《海军教育》，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0年，第823页；罗尔纲：《晚清兵志》，中华书局，1999年，第147页）。

③《康有为全集》第十一册，第153页。《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9页。

④《康有为往来书信集》，第9页。此页“1922年”讹作“1992年”，当系误植。

考证疏误，大隈重信卒于1922年1月10日，当农历辛酉腊月十三，康有为《祭大隈文》作于11天后的腊月廿四日^①，故《祭大隈文》“去春”一语，犹指1920年庚申之春。故可知台藏手稿确切系年应作“1920年夏”，这在时间节点上与佚札第二通的“庚申七月十三日”（1920年8月26日）是接榫的。两札既然作于同一时间段，就更不可能是先后寄出的两封不同函札。

再者，康有为佚札第二通为“大隈文书”所收藏，且存信封，显是已经实寄且为收信人收藏的定稿。而台藏手稿尽管不知其流传始末，但此文献信息中并无大隈重信阅读及收藏的任何痕迹，故从事理上亦可推断此手稿只是曾在大陆及台湾递藏的未定草稿而已。

第三通(著录号：I4 B0269 0005)

曾广伦还，承知兴居万福，至慰，并问，勤勤厚意，感甚。顷令门人徐勤之子徐良（美学生，前外部金事）东来，令其晋谒代达，望赐住接，敬请大隈侯爵大安。

康有为启，九月十一日。

按，第三通系康有为命徐良于大隈重信处晋谒代达时的介绍函。本札首先说“曾广伦还，承知兴居万福”云云，可知此函作于曾广伦回国后不久，可与佚札第二通相衔接，故落款“九月十一日”当即与第二通同作于1920年。

徐良为徐勤之子，早年留学日、美，忠于逊清，后任汪伪政府外交次长、驻日本大使等。事迹见于溥仪《我的前半生》及卢森《徐良在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二年的主要活动》^②。关于徐良曾任外部金事一职，民国史籍多阙载，而美国华侨伍庄《收赎澳门建议书》中谓：“今忽然天予之机，前外部金事徐良前月自美回，谓美人愿借中国美银一千万收赎澳门。”^③这一段话恰可与康有为佚札对徐良任职的说明互相印证。

第四通(著录号：I4 B0269 0006)

门人徐勤^④书来，述公矍铄康强，此东亚之幸也，不胜懽忭。承存问殷殷，推挹过甚，不敢承也。卅年奔走，无补于国，重负明公期望而已。今者则大乱又作，长江咸震，将来俄势若南，则牵动东亚全局，非徒一国，惟长者幸有以教之。徐勤将归，令其行时，造谒受教，并请大安。康有为拜启
大隈侯爵执事

①康有为《祭大隈文》（1922年1月27日）曰：“维孔子二千四百七十二年十二月廿四日，中华康有为谨设日本大隈侯爵之位。”（《康有为全集》第十一册，第181页）

②政协三水县委员会文史组编：《三水文史》1984年第2辑，第18-20页。

③转引自黄鸿钊：《澳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4-355页。

④徐勤（1873-1945），字君勉，号雪庵，广东三水人。为康有为十大弟子之一。1890年入万木草堂，师从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徐勤追随康有为，是保皇会领导之一。中华民国初年，历任国会议员等职。1927年，梁启超、徐勤等人一同建立中国宪政党，其前身即为保皇会。著述有《孟子大义述》、《春秋中国夷狄辨》等。

七月廿五日。

按，第四通系徐勤临归国前拜访大隈重信之介绍函，兼论时事。康札所谓“卅年奔走，无补于国”，计年当系自“公车上书”（1895）始，然“卅年”未必恰指整数。本札编次于第三通1920年九月十一日之后，而大隈重信卒于1922年初，则第四通唯一可能的作年为1921年。

康有为对俄国的警惕，从1901年清廷与沙俄密约后便有史料留存，其《闻和议成而东北三省别有密约割与俄各直省人士纷纷力争》诗云“魏绛和戎岂有功？只愁云雾蔽辽东”，尤其表达了对俄国的担忧。俄国十月革命后，康有为与大隈重信的一个思想共识即是“今大患在俄化”，对俄国势力在中国的渗透保持警惕，故而反对俄国“赤化”更是康有为晚年的一贯主张，其见解可考见于《万木草堂遗稿》《外编》《戊戌变法前后》以及多封书信中^①。今佚札第四通“将来俄势若南，则牵动东亚全局，非徒一国”的说法，也可提供一条观点明确的史料。

综上所考，可将四通佚札的撰写时间列表如下：

序号	编年
第一通	1918年四月初七日（5月16日）
第二通	1920年七月十三日（8月26日）
第三通	1920年九月十一日（10月22日）
第四通	1921年七月廿五日（8月28日）

表2

四札皆是大隈重信临去世前数年康有为所寄之函札，其中虽多往来酬酢之常礼，但所涉人事及观念，颇有资于治近代史者之参考。大隈重信去世之次年，康有为又作《大隈侯大德颂》，中有“生大隈侯，为日本国魂”、“东亚有微、管之叹，欧美望黎塞留之神”诸语^②，备极称扬。今《大隈侯大德颂》手迹亦保存在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大隈文书”之中^③，《康有为全集》于此文下注出处曰：“手稿，藏早稻田大学”^④。由此可见，《康有为全集》在编纂时曾参及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大隈文书”，惜编者于四札失之眉睫，今斟录刊布并加释证于此，未尽之处，敬希方家指教。

本文信札释读曾请郁震宏、朱兆虎二先生审阅并謾正讹误，谨此致谢！

【作者简介】李成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文学文献学。

①关于康有为对俄国“赤化”态度的研究，可参林克光：《康有为反对“赤化”》，《桂海论丛》1990年第1期，第67—71页。

②《康有为全集》第十一册，第242页。

③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大隈文书”，卷轴装，一轴，铃印：康有为印、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
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著录号：T06 04710。

④《康有为全集》第十一册，第242页。